



横竖是八

可以相通

《书屋》编辑部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横竖是八

可以相通

《书屋》编辑部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横竖是水 可以相通/《书屋》编辑部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 11
(书屋文丛)
ISBN 978-7-5355-7146-5

I. ①横… II. ①书… III. ①胡适(1891~1962) —
思想评论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7625号

横竖是水 可以相通

《书屋》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文华

责任校对: 胡长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

网 址: <http://www.hneps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18×1000 16开 印张: 17.75 字数: 187000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46-5

定价: 38.5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前度刘郎今安在？

- 001 横竖是水 可以相通——胡适的交游之道
- 012 关于胡适致陈监先的三通书信
- 020 愧对胡适
- 032 王实味与胡适
- 036 怎样理解胡适
- 047 胡适春秋里的公羊谷梁
——读《胡适口述自传》中的“唐注”
- 054 胡适的书生气
- 059 唐德刚笔下的胡适

第二辑 梦里寻他千百度

- 067 从胡适与梁启超论战中学点什么
- 071 在“民主与独裁”中的胡适
- 084 也谈胡适的身份意识——致邓晓芒先生
- 093 何谓自由知识分子？——答胡胜华先生
- 100 横竖是水,为何不通?
- 109 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
- 120 胡适为何屡救陈独秀



横
竖
是
水

可
以
相
通



第三辑 隔岸犹叹前尘事

- 127 “北京政变”中的胡适
135 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挟洋自重”
143 “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152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责任观”
168 且当一部《论语》看
177 胡适与齐白石
187 胡适“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195 郭沫若亲吻胡适前后——从“旧友”到“论敌”

第四辑 多情未必真豪杰

- 221 纽约,胡适张爱玲相逢 1955
231 雨中的普林斯顿
243 费城一晚
252 橡园深深

268 编后记

横竖是水 可以相通

——胡适的交游之道

近来不少人物传记,对传主的交游,都不约而同地注重起来,更有专从交游入手探索一时代“文人集团”的著作。这至少对一般读者很有用处,交游讲清楚了,便可见出传主当时的作用、影响,他发挥这作用影响的方式与渠道,更能折射其为人。没有交游,就没有人物活动的完整历史。王元化先生曾经感叹鲁迅传难写,交游方面不易详明,也是原因之一。以鲁迅的重要,逝世不过六十年,有些交游情况就已经颇感渺茫了。许多“回忆录”,事后还须“正误”,说明是误传,误记,甚或虚构。研究者轻视交游,一至于斯。有些传记干脆抓住传主内心世界,拣出几个大关节,深文周纳地演述开来,这种写法固然凝炼,可以腾出许多篇幅来剖析人物内心,但未能正面接触复



杂的交游圈子，失之于偏，也是很明显的。

交游给胡适传作者带来的挑战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胡适乐观、开朗，朋友遍天下，叙述他的交游，选择编排材料，应该绰有余地。但朋友圈子太大，他在其中的位置，也容易看偏。何况胡适多朋友，并不说明他多知音。胡适主观与客观、内与外，处处都是矛盾，温源宁描写的坦荡清浅，只是一面。他多朋友，很可能就因为实际上少朋友；他清浅易懂，也很可能是因为另一种隐晦难懂，这才努力用直白如话的语言诉说自己，求其友声。胡适“著名的微笑”背后，也隐藏着一面捉摸不透的深的湖。

这种“捉摸不透”，鲁迅刻画得很精彩：“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杆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倘若敢于触及胡适密如蛛网的交游圈子，又愿意这样“侧着头想一想”，所以往往能够——尽管不必尽与鲁迅相同——从这“捉摸不透”里（例如至今还有点模糊的胡鲁交往）看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来。

二十年代中期尤其自女师大事件以后，鲁迅就逐渐淡化了《新青年》时代开始的与胡适的交往，许多杂文对胡的正面掎击，逐步升级。但鲁迅主要针对胡的政治主张和某些学术观点，并未否定全人。他曾经说过，“胡适之有考据癖，时有善言”，这显然有别于瞿秋白以降的批胡模式。1932年鲁迅回北平探母，处理家务，应酬，演讲，百忙中还抽空往胡宅一叙。此事见罗尔纲《胡适琐记》，鲁迅日记通信均无记载，或非信史，但据说是胡思杜亲口所讲，也不可不察。许多回忆文章只说鲁迅抵平翌日胡

适如何发表谈话,施放暗箭,当时情形,两人见面可能性极小。另一种说法,鲁迅那次并未拜访胡,只是不期而遇,一个笑问“又卷土重来了?”一个答曰“不,就将卷土重去也。”胡适日记不知可有记录,如有,该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了,晤谈内容,自然相当重要。

胡适始终没有激烈地批评鲁迅。早期器重周氏兄弟,曾请鲁迅代为定夺《尝试集》篇目,凡鲁迅认为可删,多能依从。对鲁迅小说史研究与创作,一生都给以高度评价。两人在《新青年》编辑方针和古小说考证方面往返切磋,彼此推许,更是众所周知。胡适 1929 年 9 月 4 日致周作人信,表白他器重鲁迅,具有某种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敬爱”：“你提到‘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甚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这当然不排除他和鲁迅在许多问题上的绝然异趋,但根本态度,也是对事不对人。他反对鲁迅的观点,并不抹杀全人;他不同意鲁迅许多做法,对扑面而来的鲁迅风,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但他没有故意无视鲁迅的成就与贡献,没有贬低鲁迅的人格。他反对陈西滢、苏雪林等人攻击谩骂鲁迅,认为鲁迅的功过是历史性的,只能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分析评判。这自然并不完全出于吴稚晖所说的“Gentleman 的臭架子”。无论鲁迅还是胡适,都不认为可以用世俗的方式打倒对方,都愿意历史地审视对方。有这气度,为敌为友,都会比较的爽快。

胡、鲁交往详情,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发掘。这不仅对研究胡、鲁本人有价值,将来进一步比较以胡、鲁为中心的两个不同的“文人集团”及其相互关系,打破文化疆域上似成定局的南北隔绝与京海分途,造成现代



文学史文化史新的叙述构架，都该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自古及今，文人交游之广如胡适者，确属罕有，“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原是诗家夸张恭维之辞。现代文人，稍微出名的，都有不少朋友，但多数很有限，被各种圈子圈住了。胡适也有他的朋友圈子，但比别人的更大，更松散，更能容纳异己。不管后来那些曾经将“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的人是否“看清”了他，疏远了他，背弃了他，至少在当时，他对“我们一般少年朋友”确有吸引力，以其“磁性人格”（唐德刚语），为新文化运动聚合起大批思想精锐。

胡适把交友当做一桩很严肃的事情，广结善缘，几乎是他事业的一半。著述之外，每做一件事，总会交上新朋友，或在老朋友基础上，更添一份情谊。事情过去了，旧雨新知留下来，其人格意志就通过这种方式影响他人。胡适就是胡适的朋友，不止是《胡适文存》的作者。他一生不做“自了汉”，鼓吹通过“努力”实现他的“宗教”——最终转换为社会价值的“不朽”。交友是“努力”的收获，也是“不朽”的一部分。

胡氏一生坚持在政治以外谈政治，然而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往往“人权”“王权”两面都不讨好，自命清高更谈何容易。政治对人的约束、压迫与变形，他是很能理解的，所以他并不鄙薄政治家，也不歧视一般并无劣迹的政客，明知当道者的底细，仍想“试他一试”，还鼓励学生朋友从政，努力造就“好人政府”。亦官亦学的身分固然尴尬，却帮他扩大了朋友圈子。做官的朋友，自然不是他意志的执行者，但他许多政治文化设想，和这班朋友分不开，又是事实。胡适政治上幸与不幸，成功与失败，光彩与不光彩，很大程度上都牵连那些身居庙堂的朋友，这和专攻“为己之学”或“心学”的传统型文人，自然有所不同。

会交际,也是养成胡适文化个性的关键。他留学美国七年,饱读“西书”之余,大部分时间是读“西人”,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感受其制度文化的得失优劣。温源宁说胡适英文比中文写得更好,由此可以推知他和西人交往之盛(要他做大使,主要也是看中此点)。论熟悉西方典籍,胡适不能推为首选,但留学生那么多,惟有胡适最能体现西方文化的生气,最能有效地冲击传统痼疾,虽然归国以后除“汉学”外很少再跟踪西方学术的新发展,但“西化”思想还是胡适最能一以贯之,这些都不能不归因于他在美国“深入生活”之认真彻底,所得具体感受之丰富真切,那是啃书本啃不来的。试比较胡适吴宓留美日记,看他们在美国迥然不同的交游情况,其理自明。一个那么长袖善舞,一个那么拘谨局促;一个谦谦君子,却差点爱上洋小姐,一个则道貌岸然,非礼勿听,非礼勿视;一个把留学之地当成第二故乡,一个则自认虽然留学,其实和在国内读书也无甚差别。两人文化观念径庭悬隔,实也种因于此。

归国之后,他能迅速取代章太炎、梁启超而跃登现代中国的学术杏坛,首先固然由于他提倡科学研究方法,在诸多领域均有拓荒性创获,但交游作用也不可忽视。一代学术风气的转移,实赖一二影响全局感召多士的领袖人物,而此领袖人物积极广泛的交游,又是其发挥领袖作用极其重要的渠道。蔡元培胡适,正是这样两个学界领袖,但蔡主要提供基本办学方针与制度保障,胡的作用还包括许多琐碎细致的人事。能在现代教育思想、学校制度和人事调配三方面同时发生领袖作用,当时胡适确属第一人。

胡适三十年代在北京,晚年迁台,都坚持周末的“家庭开放”(胡太太江冬秀说是“胡适之做礼拜”),人们可以不经预约前来拜访。他这天百事



不问，只接待朋友，讨论，聊天，回答种种问题，满足种种要求。更多的“朋友”则通过写信与他神交。他离开大陆时留下几大箱书信，中华书局选出一部分，编成三巨册《胡适来往书信选》，一千四百多封，真是洋洋乎大观。看他书信行文，跟做文章一样，就可以知道朋友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他的朋友并不限于官场学界，许多是陌生面孔，求他帮助，要他引荐的。不少人在信中没说几句就直奔主题，向他借钱。他用这种通信借贷法，确实尽其所能赞助过不少人。留学法国的许德珩回国没有盘缠，他代为筹借；林语堂在美国弄得一贫如洗，他慷慨汇去一千美金，还是用北京大学名义，并不期望回报。

中国成名的学者，一般对尚未成名的后生小子，总有一种古怪的畏惧和嫌恶，畏惧他们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嫌恶他们功底不深，好发大言。这两种心理，胡适都没有。他仅凭一篇考证文章，就决定识拔青年学人周汝昌，全不顾念周研究《红楼梦》会超过自己。初次见面，便慨然借给周《石头记》“甲戌本”（他收藏这个孤本，视若珍宝，1948年底仓皇南下，扔下几百箱图书，简单的行李中，只有正在做考证的《水经注》与这个“甲戌本”），还允许周氏兄弟在家里进行复制。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胡适在政府学界和社会上的朋友，有多少“如己者”呢？也许正因他能反圣人之道而行之，有交无类，才有那么多朋友吧。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当然不是叫人放弃立场，滥交朋友。他有时也会因观点立场不同而和旧日朋友疏远隔绝。显著的例子，可以举章士钊、梅光迪。胡适自有成其为胡适

的立身标准,这个无需多说。“不疑”,只是不要瞎猜测,不整天防范人家,不拿高得不能再高自己也够不着的“形而上”标准裁量他人,不苛求,像古今无数理学家那样,动辄做尖酸刻薄的诛心之论,而是叫人宽以待人,是在重复“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那句老话,是鼓励人人心中存一个精神的大海,容纳、消化各种人性的污秽杂质。

有一封书信经常被人引用,是傅斯年 1920 年从英国写给胡适的。傅这样谆谆教诲他的老师:

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但凡觉到了成就,顿时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识与力,自必精勤继续未竟之业。总之,为个人言,古来成学业者,都是期于白首,而不隐于才华;为社会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社会上的名望,我常倒转说:“不可怀也,亦可畏也”。先生自提倡白话文以来,事业之成就,自别人看之实在可惊,则人之天性,本是以成就而自喜,以自喜而忽于未来之大业。所以兴致高与思想深每每为敌。人性最宜于因迫而进,而惰怠于实至名归之时。

这些话都不是说先生如此,乃谓名成之下更危险,不可不预防。易多牵连,便多危险。先生不要误会,此非言已有此象,乃谓有不可不防者——预防社会止住自己的进化。

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大,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



备一席。

尽管申明“不是说先生”，不是“已有此象”，但我们很容易看出，傅是在批评他的老师，是在指出“已有此象”，是在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这自然出于他的率直，爱之愈切，言之愈重，但能这样做，敢这样做，肯这样做，主要还是凭了他对胡适的信任：信任胡适的容忍度，信任胡适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理性，信任他推己及人敢于用平常教训学生的话来“反求诸己”的勇气。胡适多直谅多闻的诤友，少以利聚散唯唯诺诺的密友，这从他和傅斯年的师弟之谊中，可见一斑。

“诤友”自然不是毫不讲人情味，相互苛求，彼此挑刺，一言不合，即兵戎相向。这样“诤”法，是“友”不起来的。诤友诤友，既诤且友；而且惟其“诤”，惟其识得大体，反而更能容忍对方或有的小缺陷，怪脾气。因小失大，在小节上钻牛角尖，就不会有“诤友”了。

胡适更常讲“容忍”，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是宽容，忍是忍耐，宽容而且忍耐，一个人的存在就不会太囿于自我，而和别人息息相关了。朋友中间，他往往是苦口婆心的和事佬，当“通事”，做粘合剂。北大教授（他的一班朋友）以“私德不修”驱逐另一个朋友陈独秀，他曾竭力反对，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胡适的理由显然很不高明，如怪他们拣小遗大，以细故迫使新文化运动领袖离开新文化中心，逼其左倾。但他评价人，确实分了大与小，重和轻。一团和气背后，藏着自己的标准。因为类似的理由，他真诚地规劝失和的朋友重新和解，把扬言要刺杀丁文江的傅斯年拉到了丁的身边，让性格迥异的傅斯年、顾颉刚做他的左膀右臂。他的交友标准，也因此显得游移不定，有时很高，有时很低，有时严格得近乎严厉

(因学术见解不同擅用职权解聘北京大学两位名教授林损和蒙文通却拒不接受一些朋友如钱穆、汤用彤的劝解),有时甚至表现出乡愿式的不忍人之心(企图以老朋友的资格劝毛泽东放弃武力)。类似这些事情上,他的朋友观念确实驳杂得很,有点古今错陈,中西合璧,而让人“捉摸不透”了。

对周作人的态度是一个显例。周滞留北平尚未落水时,他多次托人带信,恳求老朋友以国家民族名节为重,毅然南下,后来又亲自致书,想用梦中的思念之情打动周氏,到此可算仁至义尽,尽了朋友应尽的责任义务,不再欠朋友什么了。然而等到举国声讨“周逆”时,他对身陷牢狱的周作人又动了恻隐之心,敢背万夫所指,上下奔走,以图减轻公理正义对周的惩罚。胡适在这中间所取的朋友之义,比起国家民族的公理正义来,确是小而又小了。

小是相对于大来说的,如果不是小到没有而等于零,则小也有小的意义。对周作人,胡适肯拣小而遗大,说明人视为小者,他未必不看得很大,他在此时此刻的“小”中,看到了公理正义旁边仍然未可轻抛的对老弱的怜悯和容忍,不是容忍做了汉奸的周氏,而是容忍老病衰弱的周氏。前一种容忍显然不该,后一种容忍却未尝不可;这不仅无妨于公理正义,反而对公理正义有益(这又使人想起他1924年挺身而出为清废帝溥仪讨取公道的“梟叫”)。

他或许想望真正的一团和气,想望完全形态的公理正义——包含了朋友之间私人情谊的那种公理正义(尽管这往往很难两全)。他想要更多的人结交朋友,一起努力,一起创造;他最怕朋友们稀里糊涂成了敌人,相互斗杀,在破坏的路上越走越远。1926年5月,因女师大事件引起的笔



战正如火如荼，胡适即本着这个想法，以老朋友的名义同时致信鲁迅、周作人、陈源：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场战争的原因和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二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多着咧！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作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些做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方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会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

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这样不问是非对错的“善良愿望”,或许只是天性使然吧。又或许,幼年胡家大院的闷斗与寡母的忍辱负重,给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特别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平和。这在笔战正酣暂时还“不能带住”的当事人以及清醒的历史家看来,肯定不值一笑,但至少可以欣赏他对待朋友的那份诚恳、善良与天真。“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是水,可以相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朋友的信义,人道的正谊,不就在于此吗?曾国藩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胡适寄希望于朋友的,也就是这“一二人之心所向”。

俱往矣,当“我的朋友”只剩下一丝半缕,浮沉于后来者的叙述,一种交游之道,即会凝成无数著作封面扉页照例印出的那个“著名的微笑”,化为它深处的“捉摸不透”吗?

一个世纪的是与非梦与醒,总要驯服于时间的巨笔,但此类悬念,仍将兀立。

(郜元宝 文,原载《书屋》1997年第1期)



第一辑 前度刘郎今安在？

关于胡适致陈监先的三通书信

胡适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代宗师，对文化学术思想的影响，不仅是深远的，而且是多领域的，他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历史与现实都证明了胡适及其思想影响的客观存在。

我的书斋存藏有胡适的三通书信，就来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之后和“文化大革命”浩劫之后的民间，收藏者是与胡适有过交往的文人陈监先先生，这三通书信就是他与胡适在四十年代后期为收购一批章实斋资料的通信。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胡适于 1922 年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